

# 伊斯兰复兴运动与菲律宾穆斯林分离运动

彭 慧

**内容提要** 二战后兴起的菲律宾穆斯林分离运动与伊斯兰复兴运动下相关国家及组织的支持和干预密不可分。“9·11”事件后,随着恐怖主义在全世界的蔓延,菲律宾南部地区的穆斯林分离主义与恐怖主义合流,其已成为东南亚乃至世界恐怖组织网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而菲律宾穆斯林分离运动与伊斯兰世界关系的发展,经历了从冷战时期的相对明晰向后冷战时期的混沌状态之转化。菲律宾南部已成为世界上民族、宗教矛盾和恐怖主义汇聚的热点地区之一。

**关键词** 菲律宾 穆斯林分离运动 伊斯兰复兴运动 恐怖主义

二战结束后,伊斯兰复兴运动和地区(民族)分离主义运动相继成为席卷世界的两股潮流。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深入,两股势力中的极端派别又与恐怖主义合流,成为世界舞台上的备受关注的力量,使全球穆斯林都受到了影响。“9·11”事件后,在菲律宾南部由宗教差异而引发的穆斯林分离主义运动已发展成东南亚乃至世界恐怖主义网络的一个组成部分,臭名昭著的“阿布沙耶夫”组织(Abu Sayyaf)以其频繁且令人发指的恐怖活动而为世人所瞩目。菲律宾的穆斯林分离主义和恐怖主义以宗教极端主义为黏合剂,正在形成“三股恶势力”合流的趋势。那么,在伊斯兰复兴运动下伊斯兰世界与菲律宾穆斯林分离运动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联系?维持二者关系的动因在从冷战时期向后冷战时期演进的过程中出现在了什么样的新变数?或者说,全球化时代对二者关系的变化产生了什么样的作用?本文拟循此思路,从当代伊斯兰世界及全球政治格局演变的角度切入,力图跳出一国、一地的分析框架,以揭示菲律宾穆斯林分离运动的发展背景及深远影响。

—

自14世纪以来,在菲律宾形成了南方伊斯兰教文化与北方天主教文化两大文化圈。穆斯林主要聚居在菲律宾南部的棉兰老岛、苏禄群岛和巴拉望岛等地,其人口约占全国总人口的4.9%,主要由13个部族组成,每个部族都有各自的聚居区、语言、习俗,信仰伊斯兰教成为维系它们之间团结的纽带。菲律宾南部居民自从接受伊斯兰教以来,为保卫自己的宗教信仰和生存环境,不断地反抗外来入侵势力与“优势文化”,并在斗争中发展了自身的文化和经济。二战后,伊斯兰复兴热潮在全球兴起,处于现代与传统、分离与融合“夹缝”中的菲律宾穆斯林,仍在斗争中寻找着自己的生存发展之路。但由于无法认同于菲律宾的主流文化——天主教文化,加之政府政策失误,导致菲律宾南部的穆斯林问题凸显。菲律宾的“穆斯林问题”,即

“摩洛<sup>①</sup>问题”(Moro Problem),特指菲律宾南部棉兰老岛、苏禄群岛等地的穆斯林分离倾向及由此引发的暴力冲突。

20世纪后半期,伴随着阿拉伯国家石油经济的繁荣和1979年伊朗伊斯兰革命的胜利,伊斯兰复兴运动席卷整个穆斯林世界。这场运动是现代化和全球化背景下传统穆斯林社会对西方国家政治理念和文化扩张的回应式反弹,是“反全球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和标志性特征之一。菲律宾南部穆斯林分离运动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辟居菲律宾南部的穆斯林,人数虽少且在国内处于弱势地位,但他们基于宗教信仰积极响应全球性伊斯兰文化复兴的召唤,其宗教意识和伊斯兰认同空前高涨,与外部伊斯兰世界的联系也越来越紧密。但这一时期伊斯兰复兴运动对他们最大的影响,在于培育了一批既具有现代意识又受传统伊斯兰文化浸濡的穆斯林青年,从而形成20世纪70年代以后菲律宾南部穆斯林分离运动的中坚力量。以萨尔马特(Hashim Salamat)<sup>②</sup>为代表的留学中东的穆斯林青年深受伊斯兰激进思想的影响,他们回国后便组织穆斯林青年,以真主“安拉”的名义向由天主教徒组成的菲律宾政府提出“控诉”,发起各种形式的组织和活动,极大地化解了原先部族间的矛盾,菲律宾南部的穆斯林开始共同关注如何在天主教徒为主的政权下保持本族群的发展。而随着菲律宾国内形势的恶化和伊斯兰世界交流的频繁,该国南部穆斯林的宗教情感空前高涨起来,以密苏阿里(Nur Misuari)<sup>③</sup>和萨尔马特为代表的青年一代振臂一呼,掀起了二战后菲律宾南部穆斯林反抗运动的高潮。

伊斯兰复兴运动无疑是推动菲律宾南部穆斯林宗教意识高涨的背景条件,而伊斯兰世界对菲律宾南部穆斯林分离运动的支持则是其发展的外部动因,二者之间的互动体现在精神和物质两个层面。

1. 精神层面。“兄弟互助”是穆斯林根据伊斯兰教教义必须履行的宗教职责,它充分体现了“天下穆斯林是一家”的思想。这种思想既源于伊斯兰教教义对穆斯林与非穆斯林的明确区分,也源于实现先知的未竟事业——统一伊斯兰世界——的思想。这种理念和追求为世界上不同民族的穆斯林提供了思想、文化、政治上的认同基础,使他们在任何外来文化面前都具有非常警觉的自我保护意识和团结精神,一旦出现伊斯兰教徒与异教徒之间的冲突,这种基于宗教教义上的集体忠诚就会演变成为各地穆斯林群体对问题发生地的政治、军事卷入,菲律宾南部穆斯林问题的世界性即是这种意识和精神的典型体现。

这里要说明的是,这种“天下穆斯林是一家”的思想与伊斯兰国家内部或伊斯兰国家之间冲突频发并不矛盾。首先,穆斯林“兄弟互助”思想的主要功用在于区别伊斯兰教徒与异教徒,这种对宗教社团的忠诚“只有在区别于非穆斯林社团的意义上才能有血有肉的体现出来”。<sup>④</sup>其次,穆斯林之间的宗教情感并不是以语言、地域及文化特征为标志,加之没有坚实的共同民族利益为基础,因此一旦遇到政治现实特别是利益冲突时,穆斯林之间的“兄弟情谊”必然让位于现实诉求。这也是伊斯兰国家内部或伊斯兰国家之间纷争不断的原因之所在。然

① 即聚居在菲律宾南部的穆斯林,西班牙人入侵菲律宾时称其为摩洛人,现已成为其代称。

② 萨尔马特是菲律宾南部穆斯林分离运动的主要组织“摩洛伊斯兰解放阵线”(Moro Islamic Liberation Front 简称“MILF”;下文简称“摩伊阵线”)的核心领导人之一。

③ 密苏阿里是菲律宾南部穆斯林分离运动组织“摩洛民族解放阵线”(Moro National Liberation Front 简称“MNLF”,下文简称“摩民阵线”)的核心领导人之一。

④ 曲洪:《当代中东政治伊斯兰:观察与思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第14页。

而,对本文所论及的菲律宾南部穆斯林来说,由于他们所反抗的是几百年来穆斯林的宿敌——天主教徒,宗教因素使他们的斗争更加持久而激烈,并在伊斯兰世界激起极大的反响。

2 物质层面。菲律宾南部穆斯林分离运动的发展乃至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兴起都与二战后部分伊斯兰国家石油经济的繁荣有着密切的关系。二战结束后,中东伊斯兰国家纷纷摆脱殖民枷锁,并相继推行石油国有化政策。1960年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的成立,使得中东伊斯兰国家能够面对西方国家以“一个声音”说话,大大提高了中东伊斯兰国家在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地位,并为伊斯兰教的复兴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1976年菲律宾政府在利比亚的压力下签订了《的黎波里协定》(*Tripoli Peace Agreement*),使伊斯兰产油国控制了菲律宾80%的石油进口量。因此,伊斯兰复兴运动为菲律宾南部穆斯林分离运动的兴起创造了有利的时代条件,而穆斯林世界对当地事务的介入,是根植于伊斯兰意识的深厚土壤和建立在中东伊斯兰国家的物质基础之上的。

## 二

各个穆斯林国家和伊斯兰国际组织是如何干预菲律宾南部事务的呢?菲律宾的近邻马来西亚,曾一度是菲律宾南部穆斯林分离运动外国援助集团的骨干力量。以伊斯兰教为主体文化的马来西亚与以天主教为主体文化的菲律宾之间自独立建国以来就磨擦不断,沙巴地区的归属权问题和20世纪中叶沙巴州州长穆斯塔法对菲律宾南部穆斯林分离运动的支援,曾经是两国矛盾的焦点。

沙巴争端实际上是殖民者划分势力范围的结果。沙巴与苏禄一水相隔,种群相同,文化相近,历史上两地的联系也非常紧密,曾共处于苏禄苏丹的统治之下。20世纪30年代英、美两国为平衡它们在东南亚的殖民势力,把沙巴排除在即将建立的菲律宾自治政府的领土范围之外,沙巴仍处在英国的统治之下。1963年马来西亚建国后,菲、马两国在沙巴归属问题上不肯让步。特别是在菲律宾1968年“雅比达事件”(“*Jabidah Massacre*”)<sup>①</sup>引起局势动荡后,菲方指责马方为幕后支持者,并正式宣布沙巴并入菲律宾,招致马来西亚强烈不满。此后,马来西亚加强了对“摩民阵线”等反菲律宾政府武装组织的支援力度,并通过“伊斯兰国家会议组织”(Organization of Islamic Conference,简称“OIC”;成立于1971年,下文简称“伊斯兰会议”)把菲律宾南部的穆斯林问题及“摩民阵线”引入国际舞台。这样,沙巴领土争端与菲律宾南部的穆斯林问题纠缠在一起,成为影响两国关系的敏感问题。

20世纪中叶,时任沙巴州民选州长的穆斯塔法(Tun Datu Mustapha)积极援助菲律宾南部的穆斯林反抗组织,使沙巴州成为“摩民阵线”等组织的大后方和难民营。沙巴加入马来西亚时保留了相当大的自主权,大大便利了穆斯塔法对菲律宾南部穆斯林的援助。他本人则与密苏阿里同属陶苏格人(摩洛哥人中较大的一个部族),其宗教信仰极其虔诚,菲律宾南部穆斯林分离运动兴起后,其家族中有不少亲属加入了该反政府组织,穆斯塔法本人也不例外。在他任内,沙巴成为伊斯兰世界支援菲律宾南部分离运动的中转站,“摩民阵线”等组织的成员也把沙巴当作自己的避难所和训练营。一名曾经接受训练的“摩民阵线”成员曾回忆说:“他们给我们各式各样的枪。我们的训练官是经过英国培训的。我们使用比利时制造的火箭、卡宾枪、

<sup>①</sup> 为与马来西亚争夺沙巴的主权,菲律宾马科斯总统在沙巴对面的菲律宾科雷吉多岛雅比达地区秘密招募、训练一支穆斯林军队,企图向沙巴进行渗透。受训之穆斯林士兵在了解内情之后进行了集体反抗,结果三十余人被集体枪杀。

AK47冲锋枪、反坦克导弹等, 总之应有尽有。”<sup>①</sup>同时, 菲律宾南部的战乱导致当地大批穆斯林逃往沙巴成为难民。<sup>②</sup> 据统计, 至 1983 年已有 16 万至 20 万名菲律宾南部穆斯林难民避难于沙巴,<sup>③</sup> 对于大多数“摩民阵线”成员来说, 沙巴甚至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sup>④</sup> 1976 年以后, 穆斯塔法的继任者法德·斯蒂芬斯 (Tun Muhammad Fuad Stephens) 及哈里斯·沙拉 (Datuk Harris Salleh) 等不再坚持对菲律宾南部穆斯林分离运动的支持, 但“摩民阵线”等组织仍把沙巴当作军事基地, 大批武装反叛分子依旧滞留在沙巴沿海各村庄。

如果说马来西亚是支援菲律宾南部穆斯林分离运动的前沿阵地, 那么支援这一运动的“战略纵深”就是“伊斯兰会议”。该组织自 1973 年起开始关注菲律宾南部的穆斯林问题, 并于当年成立委员会专门前往菲律宾南部视察穆斯林的生活状况。翌年召开的“伊斯兰会议”外长会议根据调查结果通过了第 18 号决议, 呼吁菲政府改变其对南部穆斯林的政策。时任总统马科斯迫于压力, 不得不邀请时任“伊斯兰会议”秘书长的穆罕默德·沃托阿米访问菲律宾, 在其斡旋下, 菲律宾政府代表与“摩民阵线”于 1975 年开始谈判, 《的黎波里协定》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签订的。1977 年马科斯违反该协定, 在菲律宾南方几省举行公民投票, 但此举遭到“摩民阵线”的极力反对。“伊斯兰会议”则组成一个 17 人的代表团前往菲律宾进行调解, 但双方都毫不让步。在同年召开的“伊斯兰会议”外长会议上, 与会国均表示了对菲律宾政府的谴责, 要求所有穆斯林国家采取各种办法帮助“摩民阵线”。<sup>⑤</sup> 与此同时, 为给菲律宾政府施压, “伊斯兰会议”将“摩民阵线”列为该组织的观察员 (本来只有伊斯兰主权国家才有加入“伊斯兰会议”的资格)。1980 年, “伊斯兰会议”采取更为激进的措施, 在其通过的决议中第一次表示支持菲律宾南部穆斯林的“自决”行动, 要求马科斯在新形势下继续执行《的黎波里协定》。但此时马科斯政权已陷入内外交困的境地, “摩民阵线”的内部分裂也导致自身力量的衰弱, 双方斗争陷入打打停停的僵局。1986 年阿基诺夫人执政后, 双方重开和谈, 但阿基诺夫人坚持走“宪法自治”和公民投票的道路, 招致“摩民阵线”及“伊斯兰会议”的不满。“伊斯兰会议”再次打出“摩民阵线”为本组织的“成员国”之牌, 阿基诺政府不得不于 1989 年设立“穆斯林棉兰老自治区”, 以缓解所面临的来自国内外的政治压力。但这仍不能满足“摩民阵线”的自治要求, 双方的僵局一直持续到 1992 年拉莫斯上台。至此, “伊斯兰会议”参与调停菲律宾南部穆斯林问题已长达二十年。“伊斯兰会议”“对这场没有结局的战争最终产生了倦意”,<sup>⑥</sup> 把关注的焦点转向了阿富汗、波黑等地。因此, 在 1993 年的“伊斯兰会议”外长会议上, 菲律宾南部的穆斯林问题被降级为地区级事务, 由以印尼为首的六国委员会全权处理。“伊斯兰会议”态度的变化为拉莫斯总统政治解决菲律宾南部穆斯林问题的方案提供了便利。“摩民阵线”此时亦无力与政府继续对抗, 双方终于在 1996 年签署停战协议, “摩民阵线”有限度地被菲律宾主流社会所接纳, 菲律宾南部穆斯林地区的紧张局势亦有所缓解。目前, “伊斯

① Genda M. G. Briar & Marites Danguilan Vitug, *Under the Crescent Moon: Rebellion in Mindanao*, Quezon City, Ateneo Center for Social Policy and Public Affairs Katipunan, 2000, p. 175

② 参见 T. J. S. George, *Revolt in Mindanao: The Rise of Islam in Philippine Politics*, Kuala Lumpur,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0, p. 236

③ 参见 W. K. Cheman, *Muslim Separatism: The Moros of Southern Philippines and the Malays of Southern Thailand*, Singapor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139

④ 参见 Genda M. G. Briar & Marites Danguilan Vitug, *Under the Crescent Moon: Rebellion in Mindanao*, p. 175

⑤ 参见 W. K. Cheman, *Muslim Separatism: The Moros of Southern Philippines and the Malays of Southern Thailand*, Singapore, p. 148

⑥ 参见 Genda M. G. Briar & Marites Danguilan Vitug, *Under the Crescent Moon: Rebellion in Mindanao*, p. 67

兰会议”虽然不再在菲律宾南部穆斯林问题的调停中唱主角,但仍在关键时刻起到“杠杆”的作用。

此外,埃及、沙特、伊朗等伊斯兰国家也曾在不同程度上以不同形式鼎力支持菲律宾南部的穆斯林分离运动。

### 三

冷战结束后,伊斯兰世界与菲律宾南部穆斯林分离运动的关系发生了变化。伊斯兰国家官方不再公开支持其活动,菲律宾南部的穆斯林分离势力本身也出现了分化。“9·11”事件前后,宗教极端思想影响下的恐怖主义活动及其世界性网络逐渐形成,地区分离主义与恐怖主义有合流的趋势。在此背景下,菲律宾南部的“阿布沙耶夫”组织和“摩伊阵线”开始活跃起来,伊斯兰国家的极端势力则从民间介入菲律宾南部的事务。

自1996年“摩民阵线”与菲政府签订停战协议后,“摩伊阵线”虽已成为菲律宾南部分离运动的主角,但“阿布沙耶夫”组织则以其极端行为令世人瞩目。“阿布沙耶夫”组织成立于20世纪90年代初,创建之初就与本·拉登的“基地”组织过从甚密,并接受其指派人员的训导和各种资助,目前该组织已成为东南亚乃至世界恐怖组织网络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摩民阵线”也早在阿富汗反苏游击战期间就与“基地”组织建立了联系,公开接受恐怖组织的资金和人力支援。“9·11”事件后,全球大有进入世界性恐怖网络与以美国为首的反恐阵线斗争的时代之势,菲律宾南部的局势也在此大背景下日趋复杂。一方面,“阿布沙耶夫”组织在其他恐怖组织的配合下,其嚣张气焰不但没有因为“9·11”事件后菲律宾与美国的反恐合作行动而有所收敛,反而公开挑衅美国的权威,并掀起了新一轮报复性恐怖活动,使得菲律宾南部的局势不断恶化。另一方面,两极世界的终结和全球反恐行动分化了伊斯兰世界,其中多数“温和派”国家不再出于伊斯兰意识而干预菲律宾南部的事务;为与恐怖组织划清界限,也不再公开支持菲律宾南部的穆斯林分离运动。原先菲律宾南部穆斯林分离运动的主要支持者马来西亚和“伊斯兰会议”在新的情势下都以调停者的身份出现,前者从2001年起斡旋了阿罗约政府与“摩伊阵线”之间的和谈;后者则与东盟等国际组织一道对“摩伊阵线”施压,要求该组织在菲律宾宪法范围内通过和谈与政府达成妥协。而“摩伊阵线”为了应对新形势,不得不改换策略,一方面力图通过谈判获得自身权益,另一方面却仍与“伊斯兰祈祷团”(Jemaah Islamiyah,简称“JI”)等恐怖组织保持联系。“摩伊阵线”发言人多次公开否认该组织与“阿布沙耶夫”组织及“基地”组织有任何联系,甚至表示愿意与菲律宾军方携手解决阿布沙耶夫问题。<sup>①</sup>这在客观上又减缓了菲政府所面对的压力,阿罗约政府顺势全力进行反恐战争,试图借美国之手铲除“阿布沙耶夫”组织。

但实际情况远非阿罗约政府所希望的那样简单。首先,菲律宾国内的反恐战争虽然取得了一定的威慑性效果,但“阿布沙耶夫”组织的力量并没有受到实质性的打击。菲律宾军队的腐败无能、南部地方军队对菲律宾南部穆斯林的同情及南部的地理环境,为“阿布沙耶夫”组织成员的藏匿和逃窜提供了条件;该组织公开接受“基地”组织等的支援,也使其生存和“东山再起”成为可能。其次,“摩伊阵线”甚至“摩民阵线”虽然表面上都向菲政府极力表明与恐怖

<sup>①</sup> 参见 Kumar Ranakrishna & See Seng Tan (eds.), *After Bali: The Threat of terrorism in Southeast Asia*, Singapore: Institute of Defence and Strategic Studies,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2003, p. 106

势力毫无瓜葛,但这并不代表下层普通穆斯林的心愿。菲律宾南部穆斯林中同一部族甚至同一家族的成员虽然隶属不同的反政府组织,但他们并不会因为组织差别而互存异心,在他们看来,“对友谊和亲情的义务远比对国家的忠诚来得重要”。<sup>①</sup>可以说,“摩伊阵线”、“摩民阵线”试图与“阿布沙耶夫”武装拉开距离也只是上层领导的一厢情愿而已。同时,“摩伊阵线”、“摩民阵线”本身组织松散,下属派别不服从统一指挥乃常有之事。有证据表明“摩伊阵线”的一支队伍曾于2002年“巴厘岛恐怖事件”中为“伊斯兰祈祷团”提供了援助。<sup>②</sup>而在“摩伊阵线”和“摩民阵线”旗号下游弋着的大批“无指挥者”(lost commands)更无组织观念和国家观念,在与菲律宾政府对抗的各种军事力量中都能发现这些身份模糊的战斗人员的身影。总之,菲律宾南部各部族的穆斯林在共同宗教信念的驱使下与政府军对峙,发展出一种适合其组织形态的对抗方式,且其组织成员也有身份模糊化的倾向,从而使菲律宾南部成为该国乃至整个东南亚地区宗教群体非常规性反叛的主战场之一。

#### 四

与冷战时期相比,后冷战时期,或者说全球化时代,在伊斯兰世界与菲律宾南部穆斯林分离运动的互动中出现了什么样的变数呢?冷战时期,菲律宾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的一分子,而作为“第三股势力”(第三世界)的伊斯兰世界虽然不属于东方阵营,但在反帝、反殖这一点上与东方阵营是一致的,所以西方阵营在对待菲律宾南部的穆斯林问题是站在菲律宾政府一边的。在阵线分明的国际舞台上,伊斯兰世界与菲律宾南部穆斯林分离运动所面对的“敌我关系”毫不含糊,推进二者关系的动因也相对清晰。冷战结束后,世界呈现多元化格局,伊斯兰世界本身也在日益分化。在菲律宾国内,马科斯政权垮台后的历届政府对菲律宾南部穆斯林分离运动采取了“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菲律宾南部穆斯林分离运动内部也分化成温和派与激进派。在此形势下,伊斯兰世界一味支持菲律宾南部穆斯林武力反抗的可能性与现实性大大降低。全球化的发展又进一步使伊斯兰世界和菲律宾南部穆斯林分离运动的关系呈现混沌局面。“全球的世界”比“国际的世界”更加复杂,代表着更多的变化性而非连续性。<sup>③</sup>菲律宾南部的穆斯林分离运动已无法因其宗教意识形态而获得伊斯兰国家官方的支持;相反,伊斯兰民间力量作为超越国家的力量,日益成为该运动外在支持的主力,伊斯兰极端主义与恐怖主义势力在其中扮演了引人注目的角色。然而,也只有如“阿布沙耶夫”组织那样的恐怖组织,才敢于公开接受这种支持。另一方面,菲律宾南部的穆斯林分离势力本身也更加不再是“铁板一块”,各组织领导层与普通成员之间的意识形态错位日益明显。这些情况也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外部对菲律宾南部穆斯林分离运动支持的一致性和连续性。

显然,全球化时代利益格局的多元化与宗教意识形态主导地位的丧失,成为影响菲律宾南部穆斯林分离运动与伊斯兰世界之间关系的新变数。从更微观的层次上加以分析、研究,有利于对问题本身进行深层次的解读。超越派别、地区甚至国别的统一的宗教认同普遍存在于世界上所有穆斯林的思想意识中。但就菲律宾南部穆斯林来说,其思想却有着不同于泰国南部

<sup>①</sup> Dirk J Barreveld *Terrorism in the Philippines: The Bloody Trail of Abu Sayyaf, Bin Laden's East Asian Connection*, San Jose, Writers Club Press, 2001, p. 208.

<sup>②</sup> 参见 Kumar Ranakrishna & See Seng Tan (eds.), *After Bali: The Threat of Terrorism in South East Asia*, p. 107.

<sup>③</sup> 参见庞中英:《深入“全球的世界”》,载《光明日报》,2004年12月30日。

穆斯林和印尼亚齐穆斯林的特征, 即其思想上的双重认同, 这也是影响其分离运动发展及其与外部伊斯兰世界关系的因素之一。从历史上看, 菲律宾南部穆斯林并未如泰国南部穆斯林、印尼亚齐穆斯林一样发展成为一个民族。他们不认同菲律宾这个国家, 而以宗教和部族两种认同作为其主要认同。一方面是宗教信仰上的同一性, 另一方面是世俗中的亲近感, 但因派别利益差异与世俗中的亲疏之分, 认同与冲突往往同时并存, 这就使得无论是普通穆斯林还是各反政府组织领导层在合作对象的选择上都趋于复杂化, 而且其部族间的差异往往与反政府组织、派别的界限相重合。这样, 外部伊斯兰势力在介入时, 援助对象也具有了可选择性, 这又加深了各部族、各组织间的隔阂, 不同组织为争取外援甚至不惜互相倾轧。反过来, 外部干预势力的消长也极大地左右着各自所援助组织的发展态势, 进而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菲律宾南部穆斯林部族间矛盾的演化趋势。伊斯兰世界和菲律宾南部各反政府势力或派别都在变动中不断调整自己的策略与方向, 内因与外因互相作用, 使菲律宾南部的局势呈现持续动荡与变化。可以说, 菲律宾南部穆斯林内部的差异性与外部伊斯兰势力介入的不一致性产生互动, 正是全球化时代的新变数作用于伊斯兰世界与菲律宾南部穆斯林分离运动二者间关系的具体表现。

综上所述, 菲律宾南部穆斯林分离运动自兴起后就与伊斯兰复兴运动下的伊斯兰世界密切相关, 不同的伊斯兰势力以各自的方式介入菲律宾南部事务, 二者关系的表现形式及维系动力则经历了由冷战时期的相对明晰向后冷战时期的混沌状态之转化, 而全球化时代复杂的多元格局与菲律宾南部穆斯林群体的内部差异性也相互作用, 最终使菲律宾南部成为后冷战时期世界上民族矛盾与宗教矛盾的汇聚点之一, 因而对东南亚地区乃至更大范围内的局势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

**Abstract** The Philippines Muslim separatist movement rising after WW II is inseparable with the support and intervention of relevant countries and organizations in the Islamic renaissance movement. Along with the spread of terrorism in the world after the 9.11 incident, the Muslim separatism in the southern Philippines confluences into terrorism, and become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the terrorist network in Southeast Asia and the world at large. The development of relations between the Philippines Muslim separatist movement and the Islamic world has experienced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the relative clarity in the cold war to the chaotic state after the cold war. The southern Philippines has become one of the hot-spot areas of ethnic, religious conflicts and terrorism in the world.

(彭慧, 博士研究生, 厦门大学历史系, 厦门, 361005)

[责任编辑: 吴家多]